

從愛憎由己到知人論世：重評李商隱之政治認識

[香港] 余境熹*

目 录

- 壹、引言
- 貳、關於李商隱評價之演變概述
- 參、論以人格論李商隱之詞費
- 肆、論李商隱的政治識見
- 伍、論李商隱的仕進舉措
- 陸、結論

壹、引言

李商隱（約813-約858）字義山，號玉谿生，又號樊南生，懷州河內（今河南省沁陽縣）人；唐文宗（李昂，809-840，826-840在位）時進士，唯自開成二年（837）登第，至大中十二（858）年，「竟不昇於王庭」，僅「以鹽鐵推官死」¹⁾，「官不挂朝籍」²⁾，長期沈鬱下僚，飄泊轉徙。商隱於新、舊《唐書》有傳³⁾，唯訛誤甚多，直不足信。清人馮浩（1719-1801）為撰年譜，考訂史實，遠

*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講師、香港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會主席、俄港文化交流會副會長、國際金庸研究會副會長、東亞細亞文化研究中心秘書及《東亞細亞文化研究中心學術叢刊》主編、美國夏威夷華文作家協會《珍珠港》報電腦編輯，曾召集「第一屆池莉小說研討會」、「黃河浪文學創作國際研討會」、「蕭蕭文學創作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希伯來、中國文學、語言、歷史、哲學論文四十餘篇。

1) 裴庭裕，《東觀奏記》，田廷柱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4），133。

2) 陸龜蒙，〈書李賀小傳後〉，收氏著，《甫里先生文集》，宋景昌、王立群點校（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6），270。

3) 劉昫等，《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第15冊，卷190下，〈文苑列傳

勝前人，可據之處良多，為瞭解商隱生平之主要著作；後又有張采田（一名張爾田，1874-1945）編《玉谿生年譜會箋》，岑仲勉（1885-1961）撰《〈玉谿生年譜會箋〉平質》，連番修正，乃至今日尚有考訂商隱生平者，眾說雜出，未見定議。而按劉學鍇（1933-）、余恕誠（1939-）整理，商隱今有詩594首⁴、文352篇⁵傳世，不獨為有唐詩人之殿軍，更為古代文學之典範。雖然李商隱研究於宋（960-1279）、元（1271-1368）、明（1368-1644）三代大幅落後於其他著名詩人，清代（1636-1912）以降，對其文學成就之論述卻轉而興起，所謂「唐集韓（按：韓愈，768-824）、柳（按：柳宗元，773-819）、杜（按：杜甫，712-770）之外，後者治之最勤者莫如李商隱」⁶者是也。惜哉評價義山諸賢，鮮少從其政治識見著眼，或因惡義山詩而謂其純為浪子才人，或因愛義山詩而稱其不啻匡國文士，俱為偏頗。本文議先述歷代對李商隱評價之演變，繼從人格、政治識見諸方面闡明舊說之不足，並提出對李商隱之新見解。

貳、關於李商隱評價之演變概述

「沈約憐何遜，延年毀謝莊。」

——李商隱〈漫成三首〉其二⁷

劉知幾（661-721）《史通》嘗論「夫子（按：孔丘，前551-前479）修

下》，5077-78；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第18冊，卷203，〈文藝列傳下〉，5792-93。

- 4) 統計據劉學鍇、余恕誠，《李商隱詩歌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第1至5冊。
- 5) 統計據劉學鍇、余恕誠，《李商隱文編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2），第1至5冊。
- 6) 岑仲勉，〈《玉谿生年譜會箋》平質〉，收張采田，《玉谿生年譜會箋（外一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213。
- 7) 李商隱，《李商隱全集》，馮浩注，王步高、劉林輯校匯評（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上冊，111。

《春秋》也，多為賢者諱」⁸⁾，又以《魏書》作者魏收(506-572)「性憎勝己，喜念舊惡，甲門盛德，與之有怨者，莫不被以醜言，沒其善事」⁹⁾，認為對古人、史事評論之「愛憎由己」，實為史學上一項通病。後人對李商隱的愛憎態度，大抵與其詩文亦必有關聯，故論義山者每多愛其詩而褒其事，惡其詩而毀其人者。歷代對李商隱詩之評價約為：「第一階段是宋初楊億(974-1020)等人標榜學李義山的『西崑體』，李義山的詩歌因而受到重視；第二階段是因為元明時期崇尚盛唐詩歌，忽略了中晚唐詩人及其作品，也影響到對李義山詩歌的評價；第三階段是清人對李義山詩學成就的重新確認。」¹⁰⁾對李氏之論述，因之也出現隨時而轉的情形。

晚唐李涪(生卒年不詳，9世紀時人)《刊誤·釋怪》已經說：「近世尚綺靡，鄙稽古，而商隱詞藻奇麗，為一時之最；所著尺題篇詠，少年師之如不及；無一言經國，無纖意獎善，唯逞章句。因以知夫為錦者，纖巧萬狀，光輝曜日，信其美矣。首出百工，唯是一端，得其性也；至於君臣長幼之義，舉四隅莫反其一也。彼商隱者，乃一錦工耳，豈妨其愚也哉！」¹¹⁾而自宋人反西崑以來，關於李商隱之惡評便又一併而出，繼續了李涪之流的見解，如張戒(生卒年不詳，宣和六年[1124]進士)《歲寒堂詩話》曰：「六朝顏(按：顏延之，384-456)、鮑(按：鮑照，約414-466)、徐(按：徐陵，507-583)、庾(按：庾肩吾，487-551；庾信，513-581)，唐李義山，國朝黃魯直(按：黃庭堅，1045-1105)，乃邪思之尤者。」¹²⁾明代王世貞(1526-1590)《藝苑卮言》復云：「義山浪子，薄有才藻，遂工儷對。」¹³⁾每每由詩及人，大加

8) 劉知幾，《史通通釋》，浦起龍釋(香港：太平書局，1961)，第3冊，67。

9) 劉知幾，《史通通釋》，第3冊，43。

10) 朱易安，〈「詩家」並非「總愛西崑好」〉，《文學遺產》2(2000)：42。引文中生卒年為筆者所加。

11) 李涪，《刊誤》，收《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商務印書館，1985)，第850冊，178。引文標點為筆者所加。

12) 丁福保編，《歷代詩話續編(一)》，收何文煥、丁福保編，《歷代詩話統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第2冊，563。引文標點為筆者所加。

13) 丁福保編，《歷代詩話續編(二)》，收《歷代詩話統編》，第3冊，409。引文標點為筆者所加。

毀傷，因不喜義山作品而直斥其人乃無操守、縱邪思之浪子。¹⁴⁾顏崑陽（1948- ）研論宋元明三代對李商隱詩歌之接受史，即便指出當時文人「仍然延續傳統詩關政教的觀念，並以這個觀念去解讀李商隱詩。如果從其中讀出這層意義，便給予肯定，如只見到風雲月露，男女豔情，便給予貶斥」¹⁵⁾，道盡當中評論之偏頗，其言甚切。

然則自清代以來，「詩學觀念有了較大的變化，對惟情惟美的主情型的李商隱及詩文創作持較寬容甚至讚賞的態度」¹⁶⁾，而評論者則每由欣賞義山作品，進而反推出對其人之入格崇拜，可謂走向另一極端。朱鶴齡（1606-1683）對義山詩文人品迴護最力，直指義山諸作「指事懷忠，鬱紆激切，直可與曲江老人相視而笑，斷不得以『放利偷合』、『詭薄無行』嗤摘之者也」¹⁷⁾，更言：

義山之詩，乃風人之緒音，屈（按：屈原，前340-前278）宋（按：宋玉，生卒年不詳，活躍於前3世紀）之遺響，蓋得子美之深而變出之者也。豈徒以徵事奧博，擷采妍華，與飛卿（按：溫庭筠，約812-約870）、柯古（按：段成式，約803-863）爭霸一時哉？學者不察本末，類以才人浪子目義山，即愛其詩者，亦不過以為帷房嘔媠之詞而已，此不能論世知人之故也。¹⁸⁾

一反前人舊調，甚至要求愛義山詩者不能只停留在欣賞艷詞方面，言下之意即須體味李商隱的諷諭內涵。何焯（1661-1722）《義門讀書記》亦稱義山詩「頓判

14) 黃勝雄，〈李商隱與令狐氏關係考——兼論相關詩文及史事〉（碩士論文，國立中山大學，2005），125-26；楊儀君，〈論李商隱與李商隱政治詩的關係〉（碩士論文，華梵大學，2005），6-8；韓大強，〈清代李商隱研究綜述〉，《信陽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5.5（2005）：78；劉學錯，《李商隱詩歌研究》（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1998），215-16。

15) 顏崑陽，《李商隱詩箋釋方法論》（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1），14。

16) 韓大強，〈清代李商隱研究綜述〉，82。

17) 李商隱，《李義山詩集》，朱鶴齡箋註，沈厚埭輯評，第3版（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79），8。

18) 李商隱，《李義山詩集》，11-12。

曲折，有聲有色，有情有味，所得為多」，且兼有「高情遠識」¹⁹⁾，肯定其詩品、人品，薛雪（1681-1770）《一瓢詩話》則更謂「李玉溪無疵可議，要知前有少陵，後有玉溪，更無有他人可任鼓吹，有唐惟此二公而已」²⁰⁾，使義山與之並列者，無復為一眾邪思之尤，而為人格典範之「詩聖」杜甫。迨至當世，因褒賞義山詩文而連帶稱許其人格之現象更為普遍，其中二例：

義山忠君愛國，疾聲責斥宦豎，又廣交君子，不分牛李黨派，結果反被指為「放利偷合」「詭薄無行」。然而他仍秉持著純正的自信，與整個邪閹的政壇風氣搏鬥，雖只像以卵擊石、啣石填海，他的聲音很微弱，卻已挹注全部的心力。他為了生存，屢啟陳情，要求權貴給他適當的工作……（略）²¹⁾

作為晚唐時期傑出的詩人，他不僅以他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著稱，更重要的是他的進步的政治傾向的可貴，而且正是這進步的政治傾向，才促使他的卓越的藝術風格趨於成熟。²²⁾

第一例暢言李義山之義勇正直，極盡褒揚，似乎向邪閹官場上的權貴陳情求用亦屬義正辭嚴，未免不甚妥貼；第二例推崇義山藝術成就，因之亦褒其政治取向，認為兩者相輔相成，理固而然，也為現在一些研究李商隱者的共同特色。

大略言之，宋至明三代較忽視李商隱，偶有評論者則因憎惡義山詩文，目之為邪門左道之人；清代以降，李商隱研究浸興，論者多一反前調，以義山詩品、人格俱佳。兩種論調，都惑於愛憎取捨，如貶李者執於道德審判，固無足

19) 何焯，《義門讀書記》，收《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60冊，913。引文標點為筆者所加。

20) 丁福保編，《清詩話（二）》，收《歷代詩話統編》，第5冊，211。引文標點為筆者所加。

21) 黃永武，〈李商隱的遠隔心態〉，收國立中山大學中文學會主編，《李商隱詩研究論文集》（台北：天工書局，1984），58。

22) 劉智亭，〈李商隱與牛李黨爭〉，《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1985）：73。

論；揚李者亦多想當然矣，未細察義山之具體行事，是否與詩文所示相符。故兩者俱實在未見其明，以下試詳論之。

叁、論以人格論李商隱之詞費

褒李貶李，俱以人格道德為著眼點，前者許其人格盡美，後者謂其邪僻浪蕩，莫衷一是。

煩君最相警，我亦舉家清。（〈蟬〉）²³⁾

此語為義山名句，自明清白之心，高潔特立，有不隨世俗之味道，褒李者固宜引為助證，以見李商隱之人格殊美。然則《論語·公冶長》嘗載：「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予與何誅？』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²⁴⁾聽其言而即信其行，聖人未免輕心，知其不足，隨加改正。苟能觀義山之行，校之以當世文化氛圍，則歷史真相如何，信將更為清晰。

以義山之行事論，其人實不免功利之譏，難與〈蟬〉一篇所言相合。舉其大者，舊說李商隱因婚配王茂元女，背牛附李，因遭令狐之忌，終身坎壈，已為傅璇琮（1933-）等據史實推翻²⁵⁾；尹占華（1947-）則以為商隱之得罪令狐，實因先戀於令狐家女，而於令狐家準備招其作婿，加以以親時，突與王茂元女成婚所致²⁶⁾，別創新說，唯尚待考論，使得與王氏婚配跟義山前途之關聯

23) 李商隱，《李商隱全集》，上冊，454。

24) 楊伯峻譯注，《論語譯注》，再版（香港：中華書局，2007），45。

25) 傅璇琮，〈李商隱研究中的一些問題〉，收王蒙、劉學鍇主編，《李商隱研究論集（1949-1997）》（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297-306。

26) 尹占華，〈李商隱得罪令狐絢原因新探〉，《甘肅廣播電視大學學報》13.1（2003）：1-6。

仍處撲朔迷離之間。不過義山之娶王茂元女，可肯定者，為必有功利方面之籌算。

據《舊唐書》、《新唐書》載，王茂元（775-843）於太和年間（827-835）為嶺南節度使，因「南中多異貨」，「家積財」，「積聚家財鉅萬計」，且得以其資本「交煽權貴」；後雖受甘露之變牽連，以致「罄家財以賂兩軍」，「悉出家貲餉兩軍」，卻換回「封濮陽郡侯」，「授忠武軍節度、陳許觀察使」的待遇，家業不衰。²⁷⁾跟李商隱同年進士的韓瞻即因為王茂元所喜，得與王氏女結婚，並獲丈人出資起蓋新居，義山〈韓同年新居餞韓西迎家室戲贈〉詩有云：

籍籍征西萬戶侯，新緣貴婿起朱樓。
 一名我漫居先甲，千騎君翻在上頭。
 雲路招邀回彩鳳，天河迢遞笑牽牛。
 南朝禁衛無人近，瘦盡瓊枝詠四愁。²⁸⁾

對韓瞻先於自己得娶王茂元女，並得王茂元為起「朱樓」深表傾羨。傾羨之餘，義山更欲得機與王氏聯姻，跟韓瞻分一杯羹。據唐人李肇（生卒年不詳，活躍於806-820）《唐國史補》載：「進士為時所尚久矣……既捷，列書其姓名於慈恩寺塔，謂之『題名會』；大醺於曲江亭子，謂之『曲江會』。」²⁹⁾而曲江之會，復為公卿選婿之時，《唐摭言》即謂「曲江之宴，行市羅列，長安幾於半空。公卿家率以其日揀選東床」³⁰⁾；另宋陳正敏（生卒年不詳，11-12世紀時人）《遜齋閑覽》載：「今人於榜下擇婿號『鬻婿』，按：是沿唐時風尚。」³¹⁾三者配合，即知進士赴曲江之會，得為公卿擇為「鬻婿」。李商隱上

27) 劉昫等，《舊唐書》，第12冊，卷152，〈王茂元列傳〉，4070；歐陽修、宋祁，《新唐書》，第16冊，卷170，〈王茂元列傳〉，5173。

28) 李商隱，《李商隱全集》，上冊，92。

29) 李肇，《新校唐國史補》，世界書局新校，第2版（台北：世界書局，1968年），55-56。

30) 王定保，《唐摭言》（台北：世界書局，1967），25。

31) 語見陳正敏《遜齋閑覽》，轉引自李商隱，《李商隱全集》，上冊，92。

引詩尾聯「禁鬻無人近」之意，適自透露出現時未獲婚配，卻渴想得與王氏聯姻，藉以享用榮貴的希望。陳貽焮（1924-2000）雖堅稱義山「對王氏也確乎是有愛慕之心的」，而且婚後甚有「夫婦愛情的真摯」，解讀此詩，亦不得不云「當然難說他當初毫無艷羨韓瞻而想高攀這門親事的意思」³²⁾。又如〈七夕偶題〉：

寶婺搖珠佩，嫦娥照玉輪。
靈歸天上匹，巧遺世間人。
花果香千戶，笙竽溢四鄰。
明朝曬犢鼻，方信阮郎貧。³³⁾

其詩為「借言婚於王氏之作」，以金碧輝煌之諸意象，對照自身如阮咸（生卒年不詳，活躍於3-4世紀）七夕之日豎長竿於中庭，而僅能攤大布犢鼻禪般之貧困，意在「自訴清貧，與王氏之富於財者異也」³⁴⁾，張采田更指其有「己僅得匹偶，而他人則沾其實惠」³⁵⁾之意，言甚酸澀，於斯可見李商隱日後終不能忘懷於王家之財富，其婚姻中的功利目的實是顯然存在的。³⁶⁾褒李義山者，如楊柳（1923-1992）常謂「李商隱和王氏妻的愛情是純潔的、真摯的」³⁷⁾，似乎適巧忽略了商隱娶王氏的這一原初動機。

稍作補充的是，後世每稱美李王婚配，以為其夫婦相得，尤咸嘉義山之一往情深。可是配合關於義山的種種戀愛情事，如〈柳枝五首〉³⁸⁾、〈月夜重寄宋華陽姊妹〉³⁹⁾、〈贈華陽宋真人兼寄清都劉先生〉⁴⁰⁾等詩所示其與柳枝⁴¹⁾、宋

32) 陳貽焮，〈李商隱戀愛事考辨〉，收《李商隱研究論集（1949-1997）》，160。

33) 李商隱，《李商隱全集》，上冊，235。

34) 語見馮浩《玉谿生詩集箋注》所引，轉引自李商隱，《李商隱全集》，上冊，236。

35) 張采田，〈李義山詩辨正〉，收《玉谿生年譜會箋（外一種）》，443。

36) 武榮強，〈李商隱與牛李黨爭新論〉，《唐山師範學院學報》24.6（2002）：10。

37) 楊柳，《李商隱評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103。

38) 李商隱，《李商隱全集》，下冊，674-75。

39) 李商隱，《李商隱全集》，下冊，779。

40) 李商隱，《李商隱全集》，下冊，742。

華陽⁴²⁾等之關係，可見詩人本甚多情，實難完全接受其待王氏專一如斯之論。義山詩又多隱晦無題之作，雖詞涉愛情，然或暗寓仕途，其對象何人，亦後世不得而知，即便肯定為細訴相思之作，孰能斷定必屬懷妻愛妻之證？⁴³⁾且按李商隱〈祭小侄女寄寄文〉所言「況吾別娶已來」⁴⁴⁾之示，王氏本身即已為義山再娶之妻，王氏卒後義山未嘗再娶，未必即因其人終生眷懷王氏，反而更可能乃因後期生活艱困，無以家為的慘況迫使所致。若此皆屬實，則褒李派歌頌李王婚姻之事，更應再打折扣矣。唯暫無考釋，推測之詞，姑妄言之，聊供後論而已。

另以攀結權貴言，姑撇除義山後期向令狐綯多次求進之舉，其早年之干謁生活，實俱皆功利之表現。其〈樊南甲集序〉云：

樊南生十六能著《才論》、《聖論》，以古文出諸公間，後聯為鄆相國華太守所憐，居門下時，敕定奏記，始通今體。⁴⁵⁾

義山也依循當世盛行「行卷」的風尚，於唐文宗大和三年（829）以所業文章干謁名公，而「鄆相國」令狐楚（766-837）、「華太守」崔戎（780-835）即對其頗為欣賞，令狐楚更「致之華館，待以嘉賓」（〈上令狐相公狀四〉）⁴⁶⁾，並教以朝廷章奏、社會上流行之文章書信一般須用之駢文。⁴⁷⁾而按楊柳所論，據義山〈偶成轉韻七十二句贈四同舍〉「戰功高後數文章，憐我秋齋夢蝴蝶」⁴⁸⁾，及〈上河陽李大夫狀一〉「況拔自州人，升為座客，將何以詠

41) 陳貽焮，〈李商隱戀愛事迹考辨〉，158-59；郁賢皓、朱易安，《李商隱》（台北：群玉堂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2），23-24；葛兆光、戴燕，《晚唐風韻》（北京：中華書局，2004），119-23。

42) 陳貽焮，〈李商隱戀愛事迹考辨〉，133-55；郁賢皓、朱易安，《李商隱》，17-23；蘇雪林，〈詩謎專家李商隱〉，收《李商隱詩研究論文集》，17。

43) 徐朔方，〈論李商隱的無題詩〉，收《李商隱研究論集（1949-1997）》，116-30；陳伯海，〈怎樣看待李商隱的《無題》詩〉，收《李商隱研究論集（1949-1997）》，177-89；龔鵬程，《唐代思潮》（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552-55。

44) 李商隱，《李商隱全集》，下冊，992。

45) 李商隱，《李商隱全集》，下冊，1020。

46) 李商隱，《李商隱全集》，下冊，902。

47) 郁賢皓、朱易安，《李商隱》，7-8。

歌盛德，祇奉深恩」⁴⁹⁾之句，義山更曾干謁盧弘正與李執方。⁵⁰⁾稍疑謁盧弘正事不審，然商隱之多端干謁亦明矣。其後令狐楚死，未幾義山便正式轉投王茂元幕處。而且，觀其於〈奠相國令狐公文〉自傷「天平之年，大刀長戟，將軍樽旁，一人衣白」⁵¹⁾之詞，及〈贈宇文中丞〉「欲構中天正急材，自緣煙水戀平臺。人間只有嵇延祖，最望山公啟事來」⁵²⁾之語，不安下位，迫望權貴汲引之意，實在呼之欲出。其與令狐綯作別之一信中，痛言「近世交道，幾喪欲盡」，反不如市道輩重視信義，且謂「千百年下，生人之權，不在富貴，而在直筆者，得有此人，足下與僕，當有所用意」，重點卻在同信中之「足下仕益達，僕困不動」⁵³⁾，渴望借此機會與令狐綯「盟誓訂交，以求提拔」⁵⁴⁾。種種表現，都確見商隱之求進心切，大有勢位富貴蓋可忽乎哉之意，喻於功利，而褒李者過譽義山，豈不明矣？

故此，李商隱實是功利的，然則貶李派之所論，亦不因而佔住道理。必有更深刻之知人論世，然後可明評價李商隱之非非是是。以論世言之，蓋唐人崇尚功利主義，已為學界公論。例如傅樂成（1822-1984）曾直陳唐人因儒學衰微、胡風輸入，社會上特具功利精神，其具體情況為：

唐代士大夫的好干謁競進，生活的奢侈浪漫……都與功利主義有關。唐代最著名的文人如杜甫、白居易（772-846）、劉禹錫（772-842）、韓愈等，他們的詩文中都或多或少的透露出勢利氣味，即李白（701-762）也不能免俗。但他們絕不諱言功利，杜甫〈狂歌行贈四兄〉便曾坦白的說：「兄將富貴等浮雲，弟切功名好權勢。」⁵⁵⁾

48) 李商隱，《李商隱全集》，上冊，441。

49) 李商隱，《李商隱全集》，下冊，913。

50) 楊柳，《李商隱評傳》，53-54。

51) 李商隱，《李商隱全集》，下冊，985。

52) 李商隱，《李商隱全集》，上冊，36。

53) 李商隱，《李商隱全集》，下冊，1023-24。

54) 陳貽焮，〈關於李商隱〉，《北京大學學報》2（1962）：61。

55) 傅樂成，〈唐人的生活〉，收氏著，《漢唐史論集》（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7），117-18。引文中生卒年為筆者所加。

甚至不僅一般文士，唐代連所謂「隱逸之士」在選擇廬山隱居之時，亦多懷有功利化之傾向，甚至以仕宦為隱逸的直接目的⁵⁶⁾，故傅樂成又有「像諸葛亮（181-234）的茅廬高臥，必三顧而後出仕……對唐人說是無法想像的」⁵⁷⁾之論。故商隱之干謁權貴，連姻公卿，不過為唐人精神之折光，處於有唐一代的歷史環境，似亦不必深責。

加上李商隱謀求功名富貴，更根本之原因乃在其人所遭之「家難」。考商隱十歲失怙，無所依恃，「四海無可歸之地，九族無可倚之親」，生活陷入極端孤貧之境，所謂「生人窮困，聞見所無」。想因為家中長子，雖是年紀甚輕，已得負起家族重任，先是「躬奉板輿，以引丹旒」，奉母移住滎陽，其後「衣裳外除」，父喪除後，「占數東甸」，再遷洛陽，並開始「佣書販春」的細事，替人作抄書工賺取家庭生活所需（〈祭裴氏姊文〉）⁵⁸⁾。可見李商隱童年頗多困厄辛酸，欲擺脫這一長期令人失落的境地，捨功名富貴外，尚有何事？故義山少年時代的經歷，很可能刺激過他的功利思想。而義山成人求官後，按陳貽焮的整理分析，尚有以下三項「孝友目標」縈繞胸中，使得義山不得不勉力求進，茲列表如下並解說之⁵⁹⁾：

(列表一)

孝友目標	具體情況	具體措施	日後成效
將寄葬在各地的親屬的靈柩運回原籍，歸葬祖墳	〈祭徐氏姊文〉自謂：「祖曾之前，未一完兆；骨肉之內，猶有旅魂」 ⁶⁰⁾ ，如商隱裴氏姊	急欲遷墳改葬，按〈祭裴氏姊文〉言，即要使「五服之內，更無流寓之魂；一門之中，悉共歸全之	居母喪期間，為安陽曾祖妣自滎陽返櫛懷州合葬，為堂叔李某改葬，為裴氏姊自獲嘉返葬滎陽，為徐

56) 尚妮妮，〈唐人選擇廬山隱居的功利化傾向〉，《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2007）：75-78。

57) 傅樂成，〈唐人的生活〉，118。引文中生卒年為筆者所加。

58) 李商隱，《李商隱全集》，下冊，993；楊柳，《李商隱評傳》，41-42；郁賢皓、朱易安，《李商隱》，2-3。

59) 列表內容，主要參考了劉維崇之著作，以及陳貽焮、張大新二氏之文章。見劉維崇，《李商隱評傳》（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8），145-54；陳貽焮，〈關於李商隱〉，55-63；張大新，〈李商隱「孝友」觀抉微〉，《信陽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1988）：57-61。

	亡，因逢父親罷獲嘉縣令職，匆促離開，只能暫厝於獲嘉。日後商隱於〈祭裴氏姊文〉言其有「垂興欲墮之悲，幾有將平之恨」 ⁶¹⁾ ，表現出內心苦痛	地」 ⁶²⁾	氏姊改葬，為四歲夭折的侄女寄寄自濟邑返葬滎陽，上自曾祖母，下至孺嬰，旁及堂叔，一共辦五起遷葬事宜，算是順心了卻心願
培養親屬為官作宰，重振家聲，光宗耀祖	〈祭處士房叔父文〉中，商隱為家族內做官者僅自己一人深發慨嘆，其文曰：「宗緒衰微，簪纓殆歇。五服之內，一身有官。將使澤底名家，翻同單系；山東舊族，不及寒門。」 ⁶³⁾ 恐怕家族從此式微	〈祭徐氏姊文〉稱：「仲季二人，亦志儒墨。於顯揚而雖未，在進修而不墮。」又說：「今嵩、奐二子，既為我甥，誓當撫之，以慰幽抱。男勸其學，使得祿仕。」 ⁶⁴⁾ 〈祭處士房叔文〉則復云：「斌等既幽明無累，年志漸成，則當授以詩書，諭其婚宦。」 ⁶⁵⁾ 即要教育、扶植兄弟、族人、親戚成名	大中元年(847)三月，商隱弟義叟擢進士第，然則日後功名不詳，其餘諸弟諸甥似更等而下之，此一心願並未完成
為弟妹辦理婚嫁大事；生男育女，傳宗接代	〈祭徐氏姊文〉言：「伏以奉承大族，載屬衰門。三弟未婚，一妹處室。息胤猶闕，家徒索然。將恐烝嘗有曠闕之憂，丘隴絕芟除之主。」 ⁶⁶⁾	〈祭處士房叔文〉有言「諭其婚宦。使烝嘗有奉」 ⁶⁷⁾ ，即諭使親族盡早成婚，繁衍後代	商隱親族之繁衍情況不詳，其本人卻於大中元年獲一子衰師，於〈驕兒詩〉 ⁶⁸⁾ 其子容貌俊秀、舉止活潑、時得娛樂可見，商隱雖處貧窮，然傾力供養兒子，惜王氏妻死後，衰師寄住長安，漸見痴呆，見〈楊本勝說於長安見小男阿衰〉 ⁶⁹⁾ 一詩，故此心願恐亦不甚圓滿

60) 李商隱，《李商隱全集》，下冊，990。

61) 李商隱，《李商隱全集》，下冊，993。

62) 李商隱，《李商隱全集》，下冊，994。

63) 李商隱，《李商隱全集》，下冊，991。

64) 李商隱，《李商隱全集》，下冊，990。

65) 李商隱，《李商隱全集》，下冊，991。

66) 李商隱，《李商隱全集》，下冊，990。

67) 李商隱，《李商隱全集》，下冊，991。

68) 李商隱，《李商隱全集》，上冊，429-30。

69) 李商隱，《李商隱全集》，上冊，509。

正因義山對家人頗具負擔，又懷強烈的重建家門、光宗耀祖渴望，自身先顯進榮名，無疑將更有助於他心願的達成。⁷⁰⁾而偏偏義山之三項心願，僅第一項可稱圓滿達成，故終其一生，要能重振家聲、教養後人，都還是「尚未成功，仍需努力」之事，置身這一環境之中，李商隱故不得不長期傾向功利，以圖成事矣。故所謂「李商隱的功名理想，一方面可視為晚唐時代精神的折光，一方面也帶有自身遭際所決定的鮮明個性特徵」⁷¹⁾者，誠為切當之論也！故此義山在政場上左右鑽營，也實屬無可厚非之事，無庸攻訐，亦不勞掩飾。

明乎此，則過褒商隱義高千秋，或以其純然無行敗德，俱屬迷於愛憎，以致故意惑亂史實之評論。既然論商隱之道德不足以全其人之面貌，褒李貶李，執於人格義範一端，徒是無可如何，實非切要之方。傅樂成〈唐人的生活〉一文指出，唐代社會崇尚功利，卻自能臣輩出，「政治上代有人才」，「能力極強，幹勁也足，雖不拘細行，仍無礙其自身的建樹」⁷²⁾，合理地將人物德行與能力劃分開來。假若對李商隱亦進行撇除道德、只重能力的評價，信當較稱客觀具體。以下即試從義山政治識見與具體官場行事為例，以前人較少重視的部分切入歷史人物，對李商隱進行能力方面的評價。

肆、論李商隱的政治識見

「永憶江湖歸白髮，欲回天地入扁舟。」

——李商隱〈安定城樓〉⁷³⁾

李商隱的詠史詩在他全部詩作中佔有相當大的比重，另外時事詩的創作也有一些。其對歷史人物以及時事的選擇吟詠，表現的除了有李商隱本人的偏

70) 陳貽焮，〈關於李商隱〉，55-56。

71) 張大新，〈李商隱「孝友」觀抉微〉，59。

72) 傅樂成，〈唐人的生活〉，118。

73) 李商隱，《李商隱全集》，上冊，114。

嗜，更可見其人對政治之見解與諷諭，是研判李氏政治識見的重要材料。⁷⁴⁾以主題予以區分，義山詠史之作固屬包羅較廣，自楚靈王（半圍，?-前529，前541-前529在位）、楚頃襄王（熊橫，?-前263，前298-前263在位）與宋玉，至漢武帝（劉徹，前156-前87，前140-前87在位）、曹植（192-232）、甄宓（181-221），到近世南北朝（420-589）及隋朝（581-618）的末代君主，再到當代的唐玄宗（李隆基，685-762，712-756在位）、楊貴妃（楊玉環，719-756），俱有詩篇歌諷；⁷⁵⁾在時事上，則劉蕡（?-842）貶柳州司戶參軍道死、太和九年（835）甘露之變等，皆翻成詩章，並有諷敬宗（李湛，809-826，824-826在位）、武宗（李炎，814-846，840-846在位），悲文宗、楊賢妃（?-840）諸作。⁷⁶⁾然若以其帶諷諭君王意味的詠史詩稍作分析，箇中反覆吟誦的政治見解實在不見得相當高明，試列一表如下以觀之⁷⁷⁾：

(列表二)

作品	諷詠帝王	諷詠內容	政治思想歸類
〈楚宮〉 ⁷⁸⁾ 〈岳陽樓〉 ⁷⁹⁾ 〈有感〉 ⁸⁰⁾	楚頃襄王	頃襄王沈迷美色，導致無心國政，國家破敗	刺君主多慾、荒嬉
〈茂陵〉 ⁸¹⁾ 〈漢宮〉 ⁸²⁾ 〈漢宮詞〉 ⁸³⁾	漢武帝	漢武帝沈迷遊獵、妄信長生、多情好色	刺君主多慾、迷信
〈齊宮詞〉 ⁸⁴⁾	齊廢帝東昏侯（蕭寶卷，483-501，499-501在位）	沉溺女色，奢靡地安排潘貴妃（潘玉奴，生卒年不詳，5-6世紀時人）的步步金蓮，以致荒殆國事，臣下叛變而亡	刺君主多慾、荒嬉
〈南朝〉 ⁸⁵⁾ 〈景陽井〉 ⁸⁶⁾ 〈陳後宮〉 ⁸⁷⁾ 〈陳後宮〉 ⁸⁸⁾	陳後主（陳叔寶，553-604，583-589在位）	後主沉溺張麗華（559-589）等之美色，又往往與群臣荒飲至醉，迷不知返，任憑宗廟煙煤	刺君主多慾、荒嬉

74) 方瑜，〈李商隱的詠史詩〉，收《李商隱詩研究論文集》，407。

75) 方瑜，〈李商隱的詠史詩〉，409-38。

76) 曾克崑，〈李商隱之詩及其風節〉，收《李商隱詩研究論文集》，208-12。

77) 列表中，筆者於用例及內容上均參考了郝賢皓、朱易安之著作，以及陳貽焮與方瑜二氏之文章，並根據其適用與否進行篩選整理。參郝賢皓、朱易安，《李商隱》，121-26；陳貽焮，〈談李商隱的詠史詩和詠物詩〉，《文學評論》6（1962）：103-5；方瑜，〈李商隱的詠史詩〉，409-38。

〈南朝〉 ⁸⁹⁾	南朝諸帝	以江南之形勝、王氣，而僅足以偏安，坐視神州陸沉，事因帝主無有混一之志	刺君主苟且
〈北齊〉二首 ⁹⁰⁾	北齊後主（高緯，556-577，565-577在位）	後主寵馮小憐（?-577），以致兵事失利，國以之亡	刺君主多慾、荒嬉
〈隋宮〉 ⁹¹⁾ 〈隋宮〉 ⁹²⁾	隋煬帝（楊廣，569-618，604-618在位）	煬帝沈迷龍舟之遊，與陳後主俱迷不知改之亡國君主	刺君主多慾、荒嬉
〈龍池〉 ⁹³⁾ 〈驪山有感〉 ⁹⁴⁾ 〈馬嵬〉二首 ⁹⁵⁾	唐玄宗	玄宗迷戀子媳楊玉環，並冊之為貴妃，有淫穢之跡，終因沈迷女色而起安史禍亂，倉皇奔蜀	刺君主多慾、荒嬉

可以見出，李商隱詠史諸作，在檢討政治之衰亂時，大體皆歸罪於帝主之多慾、荒嬉，乃至迷信、苟且種種失德舉措之上。這一純粹強調帝主才具、忽視客觀條件的識見，固然失於片面，與真實政治難以配合，不外乎將帝主劃明賢愚、倡論勤有功戲無益一類之語，藝術價值固高，但思想深度卻尚欠火候，不過是繼承著渴望聖主明君的普遍思想來發言。另外，除以國之存亡盡繫於天

- 78) 李商隱，《李商隱全集》，下冊，745。
79) 李商隱，《李商隱全集》，上冊，277。
80) 李商隱，《李商隱全集》，上冊，477。
81) 李商隱，《李商隱全集》，上冊，261。
82) 李商隱，《李商隱全集》，上冊，264。
83) 李商隱，《李商隱全集》，上冊，238。
84) 李商隱，《李商隱全集》，下冊，579。
85) 李商隱，《李商隱全集》，下冊，722。
86) 李商隱，《李商隱全集》，上冊，145。
87) 李商隱，《李商隱全集》，上冊，17。
88) 李商隱，《李商隱全集》，上冊，19。
89) 李商隱，《李商隱全集》，下冊，721。
90) 李商隱，《李商隱全集》，下冊，753-54。
91) 李商隱，《李商隱全集》，下冊，725。
92) 李商隱，《李商隱全集》，下冊，726。
93) 李商隱，《李商隱全集》，下冊，633。
94) 李商隱，《李商隱全集》，下冊，629。
95) 李商隱，《李商隱全集》，下冊，640。

子一身外，李商隱作品所反映的「女色禍國」見解亦不過踵承先秦兩漢以還，歷代相沿未革的病詬美女思想，在唐代強化女禍論述絕對性的環境下所生出的產物⁹⁶⁾，如所撰兩首〈華清宮〉：

華清恩倖古無倫，猶恐蛾眉不勝人。
未免被他褒女笑，只教天子暫蒙塵！⁹⁷⁾

朝元閣迴《羽衣》新，首按昭陽第一人。
當日不來高處舞，可能天下有胡塵。⁹⁸⁾

將導致唐代國勢急衰的安史禍亂歸罪於楊貴妃，同樣地是將敗亂史事的責任指派給某些特定歷史人物，偏頗狹隘，難經深究，人云亦云，實無高見之可言。退而論之，即不管義山對歷史政治之見解是否成熟，其作品只從否定方面評斷各朝衰亡因由，終未能提出積極改革時政措施，豈非流於空泛批判而無具體建設？董乃斌（1942- ）即便指出，李商隱在面對中晚唐每況愈下的政治局勢時，雖然「對政局不為無見」，卻是既「沒有新的目標」，也「提不出具體的改革方案」，「沒有一系列起碼是自信管用的方略」，因此董氏認為商隱僅僅是「熱心政治而不懂政治，是正直敏感而缺乏處置實施之才的人」⁹⁹⁾。而桐島薰子（KIRISHIMA Kaoruko, 1964-）也在其《晚唐詩人考》中，將李商隱與晚唐另一重要詩人杜牧（803-約853）進行比較，認為杜牧之憂國意識堅定徹底，而李商隱則迥然有異，政治視野較為狹窄，所表現出的憂國意識也明顯存著界限矣。¹⁰⁰⁾驗之義山詩，其論甚確。

至以時事詩論，沈德潛（1673-1769）《說時碎語》嘗稱許李商隱云：

96) 劉詠聰，〈唐宋以來「尤物禍國敗家」思想的發展〉，收氏著，《女性與歷史——中國傳統觀念新探》（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3），41。

97) 李商隱，《李商隱全集》，下冊，622。

98) 李商隱，《李商隱全集》，下冊，626。

99) 董乃斌，《李商隱的心靈世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237。

100) 桐島薰子，《晚唐詩人考：李商隱、溫庭筠、杜牧の比較と考察》（福岡：中國書店，1998），26、136-38。

「義山近體，裨績重重，長於諷諭……至云『但須鸞鴛巢阿閣，豈假鴟鴞在泮林！』不愧讀書人持論。」¹⁰¹⁾不知讀書人氣太重，正反映義山政治識見之淺陋。本文以李商隱尚為布衣時對甘露之變所發議論為據，試稍論之。〈有感二首〉自注云：「乙卯年有感丙辰年詩成。」¹⁰²⁾醞釀一年，可據此認為李商隱是頗認真地對待這場事變的，並且他的詩是嘗試對這一重大政治事變作出深刻反映的。¹⁰³⁾誠然，〈有感二首〉謂李訓(?-835)、鄭注(?-835)「如何本初（按：袁紹，154-202）輩，自取屈釐（按：劉屈釐，?-前90）誅」、「竟緣尊漢相，不早辨胡雛」、「臨危對盧植(?-192)，始悔用龐萌(?-30)」，「素心雖未易，此舉太無名」之論，也洞見出事變失敗之某些方面。蓋甘露之變的失敗因由，在於李訓謀事不密、舉止輕率，以致臨機發難，同謀者莫能契合，終於北司反戈一擊，謀誅宦官者即蕩盡無餘，連累之廣，乃至有宦者仇士良(781-843)等「分兵閉宮門，索諸司，捕賊黨。諸司吏卒及民酤販在中者皆死，死者又千餘人」¹⁰⁴⁾之事，賈餗(?-835)、王涯(?-835)等將相大員，皆同受戮。事變告終，反使宦人氣燄更張，自是「權歸士良與魚弘志」¹⁰⁵⁾矣，故李訓舉事之無名，無乃乎史蹟斑斑，與商隱所表，略屬一致¹⁰⁶⁾。然謂李商隱對甘露之變確有深刻認識，則為斷無道理之事。考甘露變後，白居易、劉禹錫、杜牧等文士俱以失敗之由歸於李訓、鄭注，此一論調，已成當時朝士之基本輿情，義山之作，反屬後出，沿此基調，實無明顯拔高之處。唯獨義山撰

101) 丁福保編，《清詩話（一）》，收《歷代詩話統編》，第4冊，665。引文標點為筆者所加。

102) 李商隱，《李商隱全集》，上冊，47。

103) 李長慶、張輔麟、米治國，《李商隱及其作品》（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1989），36；楊柳，《李商隱評傳》，73。

104) 司馬光，《資治通鑑》，胡三省音注，標點資治通鑑小組校點（北京：中華書局，1956），第9冊，卷245，7913。

105) 劉昫等，《舊唐書》，第15冊，卷184，〈宦官列傳〉，4771。

106) 董乃斌，〈唐人看甘露之變〉，《中華文史論叢》1（1981）：105-6；王壽南，〈李訓與甘露之變〉，收氏著，《唐代人物與政治》（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216-23；湯承業，〈論李訓所以敗於仇士良〉，《食貨月刊》復刊3.7（1973）：327-29。

詩之時，仍屬布衣，故較為便於進一步「筆誅宦官」，異於各家。¹⁰⁷⁾然則異於各家，未必即為真知灼見，李義山於撰〈有感二首〉之後，意猶未盡，在聞悉昭義節度使劉從諫(?-843)三度上書朝廷質問王涯等人之罪，聲言「謹當脩飾封疆，訓練士卒，內為陛下心腹，外為陛下藩垣。如奸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¹⁰⁸⁾後，竟復書〈重有感〉一篇，主張節度使進兵長安，其詩云：

玉帳牙旗得上游，安危須共主君憂。
竇融表已來關右，陶侃軍宜次石頭。
豈有蛟龍愁失水，更無鷹隼與高秋。
晝號夜哭兼幽顯，早晚星關雪涕收。¹⁰⁹⁾

其中「竇融表已來關右」，指劉從諫上表之事，「陶侃軍宜次石頭」，則為「傷他鎮無與之同心，兼諷刺逗留不進」¹¹⁰⁾，建安石頭城為六朝帝居，言下大有著強藩兵壓帝京之意。即此一端，已知義山有為國之心，而無匡國之智。

蓋甘露變時宦官所恃者神策軍，而神策軍為朝廷之嫡系、天子之爪牙，乃唐室在藩鎮割據之局勢下賴以生存的支柱，自唐德宗(李适，742-805，779-805在位)以還中官得秉其兵柄，實因皇帝之信任使然也。¹¹¹⁾而宦官雖恃勢橫行，對唐代社經造成了不少破壞，其任職中樞卻實際上長期對維護唐王朝的生存起著重要作用，在某程度上亦實為皇權之支持者，與皇帝構成的是相互沒有根本利害衝突而反是利益相關的共一集團。¹¹²⁾因此甘露變前，文宗本心亦

107) 詹滿江，《李商隱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5)，218-28、235-36；董乃斌，〈唐人看甘露之變〉，105-6；方堅銘，〈李商隱對甘露之變的態度及其經驗模式的形成〉，《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9.5(2003)：695-96；趙木蘭，〈李商隱政治詩中的「甘露之變」〉，《山西煤炭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2001)：66。

108) 司馬光，《資治通鑑》，第9冊，卷245，7923。

109) 李商隱，《李商隱全集》，上冊，53。

110) 語見賀裳《載酒園詩話》，轉引自李商隱，《李商隱全集》，上冊，55。

111) 王壽南，《隋唐史》(台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86)，296-97；張豈之主編，《中國歷史·隋唐遼宋金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66。

112) 馬良懷，〈唐代宦官考述〉，《廈門大學學報(哲社版)》4(1989)：39-40、43；馬良懷，〈唐代宦官與皇帝關係考論〉，《華中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5

不在蕩清宦官階層，而只欲去除當中之顯貴者，事後仍有培植親近宦者以抗衡朝官的可能，整個行動只是如先前除王守澄（?-835）而重用仇士良般的依樣畫葫蘆戲法。假使強藩入京，盡戮宦官，得操大柄，皇帝連充當自身爪牙的家奴亦無以保護，其統緒實自當陷於更大危機，東漢之十常侍亡而董卓（?-192）亂政，日後唐昭宗（李晔，867-904，889-904在位）時崔胤（854-904）謀誅宦官而朱溫（852-912）篡唐，都間接印證此一可能的演變方向。¹¹³李商隱讓強藩進兵首善之議，不僅於考慮未周上更遜於李訓之流，在禍患上甚至可比肩於史籍留污之崔胤，所謂「素心雖未易，此舉太無名」，則義山豈有異於其所議者哉？此未免受作詩自諷、五十步而笑百步之譏矣。

故此，大體上李商隱創作之詩篇，只屬稍稍負起士人的言責傳統，對荒唐昏庸之君主、弄權竊柄之宦者加以批評，呼籲統治者勵精圖治、選賢任能，實際上其人對唐室盤根錯節的敗滅因由，複雜多變的君主、宦官關係，俱乏理解，更遑論對波譎雲詭的政治權術有深刻認知。因此，他才會有讓藩鎮勢力入京誅除宦官而能振扶唐室之奇想，而他對於政治的識見也從不超於判別忠奸的視野，只能將國之興衰與聖君賢臣連結思考，外圍之局勢人事則俱無一論。如果將李商隱的簡易論述置於真實的政治場景之中，無疑地是要顯得膚淺而幼稚的，甚至得像李訓、鄭注等人一樣，會因舉措的失誤而禍國辱身。所以，從識見的層面作一評斷，李商隱的能力實是不高的。其人之終生官不掛朝籍，固然使詩人有時不與我、命途坎坷之嘆，只是置身十數個世紀以後的評論者，在對唐代末年政治風波有所理解的情況底下，豈不宜在欣賞李氏詩文的同時，為義山之不必於政治場中涉凶履險略感心安？假如還停留在因李氏寫出關懷國事之詩篇，而力褒其人別具識見之地步，則未免是對歷史之認識流於表面矣。

(1987) : 67。

113) 雷巧玲，〈「甘露之變」發微〉，《陝西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4.3（1995）：72。

伍、論李商隱的仕進舉措

令狐綯後期與李商隱的關係是否對立，目前尚不可知，但二人詩藝之高低天壤，則確甚為明顯。《全唐詩》載錄令狐綯詩〈登望京樓賦〉一首，其詞云：「夷門一鎮五經秋，未得朝天不免愁。因上此樓望京國，便名樓作望京樓。」¹¹⁴遣語冗廢，全無詩意，味之如同嚼蠟。可是同樣高低有別的，卻為二人為官之機敏程度。王夫之（1619-1692）嘗斥令狐綯為「懷祿固寵之鄙夫」，「既陰結內援，而不敢任誅鋤之事」¹¹⁵。可事實上，令狐綯欲懷祿固寵，自不能輕易與宦官強藩等所謂「惡勢力」相衝突，而所稱「陰結內援」，即與如白敏中等人連結成黨，一來人事之間，分結派系，本屬自然，二來作為與當時其他朝臣爭鬥之武器，同道實為必要之資本，因亦無可厚非。且令狐綯意不在安國而在興家，日後包庇家人，其子令狐滈「日事遊宴，貨賄盈門」，中外雖「為之側目」，也因「綯黨援方盛，無敢措言」¹¹⁶，亦可見其人安排之用心。反而若以善於為官論，據王夫之說，其人實甚為成功也。另有數事，可見令狐綯之為官手段：一、令狐滈因「不解而第」，當時大臣張雲、劉蛻、崔瑄疊上疏疏之，綯則上表訴子之冤，謂：「一從先帝，久次中書，得臣恩者謂臣好，不得臣恩者謂臣弱。臣非美酒美肉，安能啖眾人之口？」¹¹⁷不從眾論，曲與維護，盡將箇中不公不義，厚顏抹煞，而能得其實利，不可謂不狡。二、其人趁宣宗登極，忤合上意，「欲置德裕深罪」¹¹⁸，於大中二年，發李黨已故大員李紳（772-846）任淮南節度使時處理之「吳湘事件」，扭曲事實，替貪賊暴民之吳湘翻案，進而構陷李德裕（787-849），卒使後者遠貶崖州。¹¹⁹而

114) 清聖祖敕編，《全唐詩》（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第9冊，卷563，6531。

115) 王夫之，《讀通鑑論》，舒士彥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75），下冊，816。

116) 劉昫等，《舊唐書》，第14冊，卷172，〈令狐綯列傳〉，4467-68。

117) 孫光憲，《北夢瑣言》，收《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36冊，8。引文標點為筆者所加。

118) 劉昫等，《舊唐書》，第14冊，卷173，〈李紳列傳〉，4500。

119) 傅璇琮，〈李商隱研究中的一些問題〉，311-12；周建國，〈試論李商隱與牛李黨爭〉，收《李商隱詩研究論文集》，390。

且貶李德裕為崖州司戶參軍之制書，即由加「知制誥」¹²⁰⁾之令狐綯參與起草，以皇帝名義全盤否定德裕一生政績，並書下「縱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¹²¹⁾之語，頗有置德裕於死地、不留餘地之心意。¹²²⁾其心狠手辣不獨對敵人如是，舊說盡以令狐綯「尤忌勝己」¹²³⁾為非，若以固位立場觀之，亦無不可，而其對付溫庭筠事，惡意中傷其人品，肆加迫害；捏造事實，手段之高，當時後世，莫不信以為真。¹²⁴⁾民國（1912-1949）李宗吾（1879-1943）嘗創「厚黑學」，「不薄謂之厚，不白謂之黑，厚者天下之厚臉皮，黑者天下之黑心子」¹²⁵⁾，以為「古之為英雄豪傑者，不過面厚心黑而已」¹²⁶⁾。令狐綯非英雄豪傑，然其人得在宣宗朝為相十年，「最受恩遇而怙權」¹²⁷⁾，卻確實有賴於在適當的時刻面厚心黑。

前文已言義山為官之能，遜於令狐綯而幾與後者之舉措得宜相反。據礪波護（TONAMI Mamoru, 1937-）〈唐代的官制和官職〉之考論，就任宰相之位最典型之仕途路線，即是榮登進士第，得授秘書省校書郎（正九品上）、畿縣之尉（正九品下）或御史台之監察御使（正八品上），然後歷進中書省或門下省之拾遺（從八品上）、尚書省之員外郎（從六品上）、中書舍人（正五品上）、中書侍郎（正四品上），最後入為宰相。整個流動過程，所任皆為「清官」或「清職官」，若短時間內無重要事務處理，即很易步步擢升。¹²⁸⁾故李商

120) 按令狐綯在大中元年六月加知制誥。見劉昫等，《舊唐書》，第2冊，卷18下，〈宣宗本紀〉，618。

121) 劉昫等，《舊唐書》，第2冊，卷18下，〈宣宗本紀〉，625。

122) 傅劍平，〈李商隱與令狐綯關係要論〉，《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4（2006）：37。

123) 孫光憲，《北夢瑣言》，8。

124) 袁行霽，〈在沉淪中演進——晚唐詩歌創作趨向〉，註6，收氏著，《唐詩風神及其他》（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05），122-23。

125) 李宗吾，《厚黑學》（台北：傳文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4），20。

126) 李宗吾，《厚黑學》，13。

127) 孫光憲，《北夢瑣言》，8。

128) 礪波護，〈唐の官制と官職〉，收小川環樹編，《唐代的詩人：その傳記》（東京：大修館書店，1975），659。意譯方面也參考了余金龍，〈有關徐復觀《環繞李義山錦瑟詩的諸問題》之探討〉，《通識研究集刊》6（2004）：140。

隱初為秘書省校書郎，未幾調補弘農尉，兩項官職，皆為唐代仕宦新進所奢羨者。然其人終坎壈一生，究其原因，今人高越天言：「義山無政治手腕，不可能與政治發生因緣，成為大僚，乃是性格使然。」¹²⁹⁾宋寧娜（1945-）則具體指出義山性格中的「負氣」、「躁進」的因素，使得他在跟前輩、同輩的相處中，多方樹敵，以致仕途坎坷。¹³⁰⁾筆者認同李商隱性格中有著較多「負氣」「躁進」的因子，但具體理解與宋氏稍有不同，主要認為義山因「負氣」而「黑」不徹，「躁進」而「厚」不能，其無令狐綯之心黑面厚，許為探明其人仕途失意之重要線索。

義山之「躁進」，其中一項表現即為有著太過忠奸分明的政治認識，以致未能在該當厚起臉皮時厚起臉皮，身處晚唐黨爭劇烈的時局當中，黨性不強，而善惡觀念太明，抨擊宦官、黨人，皆出於一己正邪觀念，直言而已，不念政治之凶險、人事之複雜，為其人政壇失意之大因。於宦官方面，前述甘露之變之後，商隱撰〈有感〉二首，直斥宦官為「凶徒」¹³¹⁾，於〈重有感〉中並籲強藩進職闖宦，都在在顯示李商隱敵對宦官之態度。〈故番禺侯以贓罪致不辜事覺母者他日過其門〉¹³²⁾又為故嶺南節度使胡證（757-828）家遭宦官抄沒財產鳴冤；稍晚，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考試之劉蕡，在對策中猛烈抨擊宦官亂政，在當時士人和朝官中引起了強烈反響，其人卻因而遭到宦官嫉恨，被黜不取，後又遭遠謫柳州，卒至死於貶所。李商隱則撰〈贈劉司戶蕡〉¹³³⁾，將劉蕡擬同屈原、賈誼（前200-前168），對其剛直敢言之為政品格極為欽佩，對其遭到貶黜之政壇遭遇深表同情，事實上即為對迫害劉蕡之宦官勢力表示抗議。至劉蕡死於貶所，李商隱又接連撰成四首悼詩¹³⁴⁾：〈哭劉蕡〉、〈哭劉司戶蕡〉及〈哭劉同戶〉二首，表達對其人之敬仰，也可算是選擇一個與宦官對立

129) 高越天，〈李義山政治詩摘箋〉，收《李商隱詩研究論文集》，373-74。

130) 宋寧娜，〈李商隱其人其詩探索〉，《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2006）：64。

131) 李商隱，《李商隱全集》，上冊，47。

132) 李商隱，《李商隱全集》，上冊，56。

133) 李商隱，《李商隱全集》，上冊，174。

134) 李商隱，《李商隱全集》，上冊，190-93。

的位置而發出議論。¹³⁵⁾晚唐時期勾結得勢宦者為仕進之坦途，即便不卑躬奉迎、自污人格，為保職位，起碼亦不宜直犯中人，然商隱善惡觀念之太明，終使其反對聲音太張太露，如是便自絕於通過宦人以踏升遷捷徑之可能了。

同一處事模式，亦為商隱移用於回應牛、李黨衝突的諸事情之上。周建國（1945-）嘗指李商隱因替王茂元〈代濮陽公致劉稹書〉，又作〈行次昭應縣道上送戶部李郎中充昭義攻討〉、〈登霍山驛樓〉、〈為李貽孫上李相公德裕啟〉等詩文，支持對澤潞用兵之戰，因而與牛黨對討伐澤潞之公開反對態度相左，使之介入朋黨傾軋之中。¹³⁶⁾其說未為無理，然其時商隱身在王茂元幕，亦得各為其主，難論立場選擇之當否。商隱至為失機之選擇，當在隨鄭亞赴桂一事也。

「人主之道，靜退以為寶。不自操事而知拙與巧，不自計慮而知福與咎。」¹³⁷⁾晚唐黨爭延綿四十年，舊說兩黨各有宦官支持，且網絡廣大，故人主未敢輕除其病；然則大柄始終操於天子之手，人主或實縱容黨爭，以便從中控御朝臣，亦未可知。可肯定者，「愛臣太親，必危其身；人臣太貴，必易主位」¹³⁸⁾，李德裕於武宗朝功業甚盛，易與皇權相爭衡，加上宣宗對武宗的敵視和痛恨，「凡人之大體，取舍同者則相是也，取舍異者則相非也」¹³⁹⁾，其人乃對武宗格外尊寵信任之宰相李德裕亦無好感，兩者配合，卒助成宣宗登位伊始，就親手推倒李德裕及其構建之李黨集團的政治動作。¹⁴⁰⁾

因此，宣宗於三月下旬即位，四月就出李德裕為荊南節度使，同時貶德裕所賞識之工部尚書判鹽鐵轉運使薛元賞為忠州刺史，其弟京兆尹權知府事薛元龜為崖州司戶，標明將對李黨進行一連串的打擊。不獨此消，更兼彼長，同一時期，牛黨人物白敏中則由翰林學士承旨拜相；五月，宣宗增修佛寺的舉動又

135) 楊儀君，〈論牛李黨爭與李商隱政治詩的關係〉，86-87。

136) 周建國，〈試論李商隱與牛李黨爭〉，384。

137) 韓非，《韓非子》，張覺校注（長沙：岳麓書社，2006），42。

138) 韓非，《韓非子》，31。

139) 韓非，《韓非子》，127-28。

140) 張黎輝，〈論李德裕與唐宣宗——兼談牛李黨爭與皇權之關係〉，《周口師範學院學報》24.1（2007）：72。

表明將對武宗朝政策進行逆反。至八月，下令牛黨骨幹牛僧孺（779-847）、李宗閔（?-846）、崔珙、楊嗣復（783-848）、李珣皆由貶所北遷，除李宗閔未離貶之所而病卒外，餘皆獲逐一安排重要官職。九月，李德裕復由荊南改調洛陽，為東都留守，解平章事，逮大中元年二月，再降為太子少保分司，名義上是予其閑居洛陽，實際上只是為便於將其拘管。同月，李黨要員鄭亞亦由給事中出為桂管觀察使，隨之則會昌時宰相李回也外出為西川節度使。會昌時興舉的一些改革措施，在短短的一年多中全部停止。稍加留意，當不難辨出政局變化之動向，乃以打擊李德裕一派為鵠的。¹⁴¹⁾

偏偏這一時刻，李商隱卻選擇依附鄭亞。其〈離席〉有云：「楊朱不用勸，只是更沾巾。」¹⁴²⁾詩作於大中元年隨鄭亞出京都之時，用《淮南子·說林訓》中楊朱（生卒年不詳，約公元前400左右）的典故：「楊朱見塗路而泣，謂其可以南，可以北。」¹⁴³⁾可見其人當時作此決定，內心亦實頗感矛盾。可正如毛水清（1937-）〈論李商隱與鄭亞〉一文所已述明者，李商隱「在情感和思想傾向上是接近於李黨的，尤其是李德裕、李回和鄭亞，有一種使命感、崇高感、悲劇感。其中鄭亞是聯結的中心」¹⁴⁴⁾，李商隱終於因交情之故，選擇依隨鄭亞。其〈海客〉詩云：

海客乘槎上紫氛，星娥罷織一相聞。
只應不憚牽牛妒，聊用支機石贈君。¹⁴⁵⁾

程夢星（1678-1747）謂「亞廉察桂州，地近南海，故托之以海客」¹⁴⁶⁾。馮浩認為星娥是義山自比，牽牛比令狐綯，而支機石代表義山之文采。¹⁴⁷⁾當中牽牛

141) 傅璇琮，〈李商隱研究中的一些問題〉，310。

142) 李商隱，《李商隱全集》，上冊，276。

143) 劉安等編著，《淮南子》，高誘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91。

144) 毛水清，〈論李商隱與鄭亞〉，收《李商隱研究論集（1949-1997）》，716。

145) 李商隱，《李商隱全集》，上冊，278。

146) 語見程夢星《重訂李義山詩集箋注》，轉引自李商隱，《李商隱全集》，上冊，278。

147) 李商隱，《李商隱全集》，上冊，馮浩注，278。

因無旁證，或不專指令狐綯一人，然所「憚」之「妒」，想當來自鄭亞之敵對陣營牛黨。石雲濤（1957- ）指出，對於汲汲於仕途而苦無出路的文士，延聘入幕，改變其生活無著之處境，並將製造日後升遷之機會，故該類文士多對府主懷有感戴之情。而方鎮使府節帥與僚佐之間，亦有異於一般上下級關係，較易成為知己，互相倚重、敬慕，甚至結為姻親，在私人情誼上相當膠固。故此兩者之間，容易有在幕為賓主，入朝為朋黨之相聯關係。¹⁴⁸⁾正因兩者的關係如斯密切，李商隱在李黨失勢之時仍然「負氣」追隨鄭亞，可說即與得勢之牛黨劃清界線，從而也與顯宦之途相隔絕緣。現今黟縣保存的古民居、古祠堂群中，飾有著名一聯「快樂每從辛苦得，便宜多自喫虧來」，後句「多」字少書一點而落在「虧」字之上，題寫者用意乃在宣揚經商之道，吃小虧能佔大便宜，可吃虧總要吃在點子上，否則便無所得利。¹⁴⁹⁾以仕宦得失論，商隱或可謂「心子不黑」，「義無反顧」，吃這一虧，當為不明之舉動也。

復由「面子不厚」，李商隱無以忍受他人對李德裕之貶詞構陷，於德裕失勢之時不獨未即轉立場，反而作仗馬之鳴，力斥牛黨之非。早在大中元年，政治情勢之日益改變，已使李德裕深感亟需將其於武宗朝所起草文書、奏章匯成一編，俾其不致散失。德裕遂將這些篇章編成十五卷，寄給鄭亞，以保存歷史真實，並請其為其作序（〈與桂州鄭中丞書〉¹⁵⁰⁾）。鄭亞請李商隱替序文起草，後來因當時政治氣氛緊張，自己重加改定時乃刪去稿中明顯讚頌之詞句。而李商隱之原稿中，則有頌德裕「成萬古之良相，為一代之高士；繫爾來者，景山仰之」（〈太尉衛公會昌一品集序〉）¹⁵¹⁾之詞。在當日發如此之論，政見上明顯即與圖謀加害於德裕的牛黨人為相左。加上李商隱再代鄭亞撰〈代滎陽公上馬侍郎啟〉時，痛斥過參與構陷德裕之崔元藻「不知何怨，乃爾相窮！容易操心，加誣唱首。門生之分，尚或若斯；常僚之情，固無足算」¹⁵²⁾，與牛黨

148) 石雲濤，〈唐後期方鎮使府賓主關係與牛李黨爭〉，《許昌學院學報》1（2003）：89。

149) 黃山市黟縣旅遊局編，《古黟楹聯》（黃山：黃山市黟縣旅遊局，2001），7。

150) 李德裕，《會昌一品集》，收《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79冊，274。

151) 李商隱，《李商隱全集》，下冊，1017。

152) 李商隱，《李商隱全集》，下冊，953-54。

就更形敵對。此外，李商隱還寫了感嘆李德裕遠貶的詩，如：

絳紗弟子音塵絕，鸞鏡佳人舊會稀。
今日致身歌舞地，木棉花暖鷓鴣飛。（〈李衛公〉）¹⁵³⁾

雲臺高議正紛紛，誰定當時蕩寇勳？
日暮灞橋原上獵，李將軍是舊將軍。（〈舊將軍〉）¹⁵⁴⁾

前詩感傷李德裕之遠貶崖州，於此一牛黨大敵頗表同情之意；後詩則更含諷刺成分，程夢星箋曰：

按史，武宗崩，宣宗立，遽罷李德裕相。德裕秉政日久，位重有功，眾不意其遽罷，聞之莫不驚駭。此詩調此事也。德裕之相武宗，自御回鶻至平澤潞，當時蕩寇之勳不小，於是加太尉，封衛國公，不啻漢顯宗南宮雲臺圖畫功臣也。曾日月之幾何，遽罷政事，出鎮荆南。然則以有用之才，置無用之地，何異於漢之李廣，號稱李將軍，竟放閑置散，夜獵灞陵，空為無知之醉尉所呵，而忽其為故將軍也。¹⁵⁵⁾

就是說，李商隱是藉詩歌表達其對宣宗朝進封一批新貴，而新貴們對昔日攘回紇、定澤潞之舊將軍李德裕不但無心顧念，更反欲置其人於死地而後快的表現感到異常不滿。在當時，這樣的詩作，其政治含義是一望而知的。這也就使李商隱進一步遭到牛黨人物的痛恨。¹⁵⁶⁾同情李德裕等，興許是商隱之真情實感，但從政途爭逐的角度觀之，這種未懂掛上政治面具的做法正是為官大忌。李商隱自此失卻顯榮機會，也就屬客觀之選擇結果；而從這些對前程來說可謂錯誤的抉擇中，自可見出商隱於政治哲學尚不諳熟也。

李黨遭一網打盡以後，李商隱之仕宦從此即無足觀。除入盧弘正幕之外，

153) 李商隱，《李商隱全集》，上冊，314。

154) 李商隱，《李商隱全集》，上冊，330。

155) 語見程夢星《重訂李義山詩集箋註》，轉引自李商隱，《李商隱全集》，上冊，330。

156) 傅璇琮，〈李商隱研究中的一些問題〉，311-12。

歷任整屋縣尉、起為正六品上之太學博士，要皆由商隱厚起面皮，復向牛黨魁首令狐綯祈請拔用，而令狐綯反倒仁至義盡所成。¹⁵⁷⁾此後李商隱之仕進，已失去可供躍登高位之機會。故其人亦有所謂「自我否定」之詩，如大中三年之〈漫成五章〉及四年所作之〈驕兒詩〉。其辭謂：

生兒古有孫征虜，嫁女今無王右軍。
借問琴書終一世，何如旗蓋仰三分！（〈漫成五章〉其三）¹⁵⁸⁾

爺昔好讀書，懇苦自著述。
憔悴欲四十，無肉畏蚤虱。
兒慎勿學爺，讀書求甲乙。
穰苴《司馬法》，張良黃石術。
便為帝王師，不假更纖悉。
……（略）
兒當速成大，探雛入虎窟。
當為萬戶侯，勿守一經裘。（〈驕兒詩〉）¹⁵⁹⁾

無論是對修文的否定，抑或將寄望轉而投放到兒子身上，李商隱都自我宣判了自己仕宦之失敗。故此後他的政治路向與生涯，趨於平淡，餬口足矣，已消滅掉必欲顯榮之野心。¹⁶⁰⁾這一結局的形成，其實早在李商隱選擇追隨鄭亞之時，「心子不黑」，力挺德裕之時，「面子不厚」便注定。而商隱之不厚不黑，又由其不諳政治鬥爭，躁進負氣，忠奸觀念過於分明所致。由此可證，義山於官場處身之無識，史跡確鑿，其人之命蹇終生，想斷非歷史之偶然，而實為合乎政治鬥爭規律之必然發展。至李商隱之不諳權術，為官才能有缺，於斯復可見一斑矣。

157) 傅劍平，〈李商隱與令狐綯關係要論〉，36-38。

158) 李商隱，《李商隱全集》，上冊，415。

159) 李商隱，《李商隱全集》，上冊，430。

160) 詹滿江，《李商隱研究》，276-78。

陸、結論

曩昔評論李義山者，每多先存愛憎，然後立論，愛之者譽其人格亦佳，惡之者斥其道義有虧。故褒義山者盡以其人具憂國意識等立論，謂其愛國愛民，深具仁義風範。毀之者，則以其放利偷合，崇尚功名，不獨依附權貴，抑且立場無定，投機取巧。然則兩類論述，都不脫忠奸道德之審判，未能實事求是，從能力層面考論義山生平。本文後半遂試以義山之政治識見、仕宦舉措為例，論證其人於官場哲學略識之無，假使勉強讓他躋身顯位，只恐名利場中，人事利害，世情複雜，斷非其所能迎應，即無論其人道德如何，想斷非為政之佳選；一旦位置中朝，干忤權貴，動觸黨忌，則恐刀斧加身，反屬勢之難免。故商隱官不得掛朝籍，而傾心力為文章，不失以詩藝名後世，或當為其人較理想之結局也。故如董乃斌言：「不能實現抱負，無疑是個悲劇。可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政治的失意、生活的困頓，卻玉成了李商隱的詩歌藝術……李商隱在晚唐官場中的地位可謂卑矣，然而他在千古詩壇上的聲譽卻是崇高的。」¹⁶¹⁾其言審矣。

161) 董乃斌，〈李商隱悲劇初探〉，收《李商隱研究論集（1949-1997）》，240。

參考文獻

壹、文章

一、論文

- 尚妮妮。〈唐人選擇廬山隱居的功利化傾向〉。《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2007）：75-78。
- 張黎輝。〈論李德裕與唐宣宗——兼談牛李黨爭與皇權之關係〉。《周口師範學院學報》24.1（2007）：69-72。
- 傅劍平。〈李商隱與令狐綯關係要論〉。《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4（2006）：34-38。
- 宋寧娜。〈李商隱其人其詩探索〉。《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2006）：59-65。
- 袁行霈。〈在沉淪中演進——晚唐詩歌創作趨向〉。《唐詩風神及其他》，袁行霈著，103-23。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05。
- 韓大強。〈清代李商隱研究綜述〉。《信陽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5.5（2005）：78-82。
- 余金龍。〈有關徐復觀《環繞李義山錦瑟詩的諸問題》之探討〉。《通識研究集刊》6（2004）：115-74。
- 方堅銘。〈李商隱對甘露之變的態度及其經驗模式的形成〉。《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9.5（2003）：695-99。
- 尹占華。〈李商隱得罪令狐綯原因新探〉。《甘肅廣播電視大學學報》13.1（2003）：1-6。
- 石雲濤。〈唐後期方鎮使府賓主關係與牛李黨爭〉。《許昌學院學報》1（2003）：89-93。
- 武榮強。〈李商隱與牛李黨爭新論〉。《唐山師範學院學報》24.6（2002）：9-12。
- 趙木蘭。〈李商隱政治詩中的「甘露之變」〉。《山西煤炭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

- (2001) : 65-66。
- 朱易安。〈「詩家」並非「總愛西崑好」〉。《文學遺產》2 (2000) : 42-52。
- 王壽南。〈李訓與甘露之變〉。收《唐代人物與政治》，王壽南著，212-35。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
- 陳伯海。〈略論李商隱的政治詩〉。收《李商隱研究論集（1949-1997）》，王蒙、劉學鐸主編，87-102。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
- 徐朔方。〈論李商隱的無題詩〉。收《李商隱研究論集（1949-1997）》，116-30。
- 陳貽焮。〈李商隱戀愛事迹考辨〉。收《李商隱研究論集（1949-1997）》，131-65。
- 陳伯海。〈怎樣看待李商隱的《無題》詩〉。收《李商隱研究論集（1949-1997）》，177-89。
- 董乃斌。〈李商隱悲劇初探〉。收《李商隱研究論集（1949-1997）》，230-46。
- 傅璇琮。〈李商隱研究中的一些問題〉。收《李商隱研究論集（1949-1997）》，297-315。
- 周建國。〈試論李商隱與牛李黨爭〉。收《李商隱研究論集（1949-1997）》，382-99。
- 毛水清。〈論李商隱與鄭亞〉。收《李商隱研究論集（1949-1997）》，702-16。
- 雷巧玲。〈「甘露之變」發微〉。《陝西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4.3 (1995) : 68-73。
- 劉詠聰。〈唐宋以來「尤物禍國敗家」思想的發展〉。收《女性與歷史——中國傳統觀念新探》，劉詠聰著，29-48。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3。
- 馬良懷。〈唐代宦官考述〉。《廈門大學學報（哲社版）》4 (1989) : 37-43。
- 馬良懷。〈唐代宦官與皇帝關係考論〉。《華中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5 (1987) : 61-67。
- 劉智亭。〈李商隱與牛李黨爭〉。《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 (1985) : 67-73。
- 蘇雪林。〈詩謎專家李商隱〉。收《李商隱詩研究論文集》，國立中山大學中文學會主編，13-21。台北：天工書局，1984。

- 黃永武。〈李商隱的遠隔心態〉。收《李商隱詩研究論文集》，58-71。
- 曾克崙。〈李商隱之詩及其風節〉。收《李商隱詩研究論文集》，199-214。
- 高越天。〈李義山政治詩摘箋〉。收《李商隱詩研究論文集》，372-80。
- 方瑜。〈李商隱的詠史詩〉。收《李商隱詩研究論文集》，407-48。
- 董乃斌。〈唐人看甘露之變〉。《中華文史論叢》1（1981）：105-06。
- 傅樂成。〈唐人的生活〉。收《漢唐史論集》，傅樂成著，117-41。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7。
- 湯承業。〈論李訓所以敗於仇士良〉。《食貨月刊》復刊3.7（1973）：325-30。
- 陳貽焮。〈談李商隱的詠史詩和詠物詩〉。《文學評論》6（1962）：97-109。
- 陳貽焮。〈關於李商隱〉。《北京大學學報》2（1962）：55-63。

二、碩士或博士論文

- 黃勝雄。〈李商隱與令狐氏關係考——兼論相關詩文及史事〉。碩士論文，國立中山大學，2005。
- 楊儀君。〈論牛李黨爭與李商隱政治詩的關係〉。碩士論文，華梵大學，2005。

貳、書籍

一、中文書籍

- 龔鵬程。《唐代思潮》。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
- 楊伯峻譯注。《論語譯注》。再版。香港：中華書局，2007。
- 葛兆光、戴燕。《晚唐風韻》。北京：中華書局，2004。
- 〔唐〕李商隱。《李商隱全集》。〔清〕馮浩注，王步高、劉林輯校匯評。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
- 劉學鍇、余恕誠。《李商隱文編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2。
- 張豈之主編。《中國歷史·隋唐遼宋金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 黃山市黟縣旅遊局編。《古黟楹聯》。黃山：黃山市黟縣旅遊局，2001。

- 劉學鍇。《李商隱詩歌研究》。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1998。
- 楊柳。《李商隱評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
- 〔唐〕陸龜蒙。《甫里先生文集》。宋景昌、王立群點校。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6。
- 〔唐〕裴庭裕。《東觀奏記》。田廷柱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4。
- 李宗吾。《厚黑學》。台北：傳文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4。
- 董乃斌。《李商隱的心靈世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 郁賢皓、朱易安。《李商隱》。台北：群玉堂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2。
- 顏崑陽。《李商隱詩箋釋方法論》。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1。
- 李長慶、張輔麟、米治國。《李商隱及其作品》。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1989。
- 〔先秦〕韓非。《韓非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西漢〕劉安等編著。《淮南子》。〔東漢〕高誘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劉學鍇、余恕誠。《李商隱詩歌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
- 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台北：木鐸出版社，1988。
- 〔清〕清聖祖敕編。《全唐詩》。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
- 王壽南。《隋唐史》。台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86。
- 〔唐〕李涪。《刊誤》。收《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50冊。台北：商務印書館，1985。
- 〔清〕何焯。《義門讀書記》。收《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60冊。
- 〔北宋〕孫光憲。《北夢瑣言》。收《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36冊。
- 張采田。《玉谿生年譜會箋（外一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 〔唐〕李商隱。《李義山詩集》。〔清〕朱鶴齡箋註，沈厚燠輯評。第3版。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79。
- 劉維崇。《李商隱評傳》。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8。
- 〔清〕丁仲祜編訂。《清詩話》。第2版。台北：藝文印書館，1977。
-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 〔北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 〔清〕王夫之。《讀通鑑論》。舒士彥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75。

- 〔唐〕李肇。《新校唐國史補》。世界書局新校。第2版。台北：世界書局，1968。
- 〔五代〕王定保。《唐摭言》。〔清〕蔣光煦校。台北：世界書局，1967。
- 〔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元〕胡三省音注，標點資治通鑑小組校點。北京：中華書局，1956。

二、外文書籍

- 〔日〕詹滿江。《李商隱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5。
- 〔日〕桐島薰子。《晚唐詩人考：李商隱、溫庭筠、杜牧の比較と考察》。福岡：中國書店，1998。
- 〔日〕小川環樹編。《唐代の詩人：その傳記》。東京：大修館書店，1975。

<Abstract>

Re-evaluation on Li Shangyin in a Political View

YU, Kinghei

The different attitudes towards the poems of Li Shangyin (c.813-c.858), a prominent poet in late Tang Dynasty (618-907), have led to various evaluations on his personality. On one hand, the opposites of Li's poems often criticize the personality of Li. On the other hand, the supporters of Li's poems praise almost all aspects of him. This resulted in serious bias all over the studies on Li.

Focusing o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Tang Dynasty,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limitations of the viewpoints of both the Li's supporters and opposites, and points out that discussing the personality of Li is indeed not an appropriate way in knowing this historical figure.

Since the Tang scholars were highly enthusiastic in obtaining political success, this article chooses to re-evaluate Li through the view of politics. Based on Li's commentaries on the past historical events and current affairs and his performances in dealing with other officials, the article illustrates the weaknesses of Li and tries to provide an objective new understanding of this important poet.

Key Words : Li Shangyin, Personality, Politics

투 고 일 : 2011. 9. 10. / 심 사 일 : 2011. 9. 26. ~ 2011. 10. 10. / 게재확정일 : 2011. 10. 20.
